

吉林 (JL) 吉林出版集团

中国古代农业 生产与商业化经济研究

李睿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农业商品化是实现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内容与标志。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农业相结合、规模化农业与小农经营并存。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资源禀赋有着重大的关系。因此,对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进程进行探究,宏观地审视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从中发掘出具有现实意义的规律性认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当前农业商品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从而推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古代商业化经济兴起条件及影响因素的分析,进一步探讨古代农业生产、古代商业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书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以及古代农业商品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与探讨,将此书分为八个章节,依次进行论述。第一章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诞生及特征进行具体论述,为后文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从中国古代商业的兴起条件及商业思想等方面入手,对中国古代市场化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第三章分析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主导下的土地市场经济,并以“中国古代土地关系”“所有权结构”等为重点,对土地市场经济的多维发展进行更为清晰地说明;第四章站在“中国古代农贷经济以及资本市场”背景下,对中国古代农贷具体特点、农业资本市场对商品化经济的影响等内容进行阐释;第五章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与生产雇佣关系相结合进行详细介绍;第六章从基于地域特色和基于消费群体背景影响下的经济作物入手进行介绍;第七章以“唐宋茶业”为例,对中国经济作物商品化进行再度探析;第八章基于以上章节的分析,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商品化经济趋势进行宏观审视以及再度思考,以求探讨商品化经济趋势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撰写目的即本着实用性与可行性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人员、中国古代农业商业化等研究人员开展相关实践，与此同时，更希望能够供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方面的学生阅读参考，帮助学生促进专业知识的完善。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会有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 第一章 中国传统农业的诞生及特征 / 001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及社会条件 / 001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农业的确立及特征 / 007
 - 第三节 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兴起 / 014
 - 第四节 中国古代重农政策及措施 / 018
- 第二章 中国传统商业化经济的兴起及发展 / 022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商业的兴起条件探究 / 022
 - 第二节 中国古代市场化经济发展沿革 / 027
 - 第三节 中国古代商业政策及思想嬗变 / 033
- 第三章 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主导下土地市场经济的兴起 / 042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土地基本属性和经济价值 / 042
 - 第二节 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及所有权结构分析 / 048
 - 第三节 中国古代土地商业化进程探析 / 058
 - 第四节 基于制度体系下土地市场经济的多维发展 / 068
- 第四章 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主导下的农贷经济以及资本市场 / 079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农贷经济的产生条件及发展演变探究 / 079
 - 第二节 中国古代农贷历史演进与具体特点 / 093
 - 第三节 农业资本市场对商品化经济的影响 / 100
- 第五章 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主导下的生产雇佣关系 / 110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农业雇佣关系的产生条件及民间发展探究 / 110
 - 第二节 法制化背景下传统农业雇佣关系的常态化趋势分析 / 119
 - 第三节 传统农业生产雇佣关系对商品化经济的影响 / 127
- 第六章 中国古代经济作物种植业商业化的产生与特性 / 132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经济作物种植的萌芽与发展 / 132
 - 第二节 基于地域特色的经济作物种植业特性探究 / 139
 - 第三节 基于消费群体的经济作物种植业特性探究 / 150

第七章 中国古代经济作物商品化再探析——以唐宋茶业为例 / 157

第一节 唐宋茶业发展简史 / 157

第二节 茶文化对唐宋茶业发展的助推作用 / 165

第三节 基于市场角度探析唐宋茶业商业化经济的演变及发展 / 174

第四节 茶业经济的环节链及茶业经济历史地位 / 185

第八章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商品化经济趋势的宏观审视与影响探析 / 195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经济的突破与困境 / 195

第二节 中国古代农业商品化对传统农业的启示 / 198

第三节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商品化经济趋势的现实意义探究 / 199

参考文献 / 202

第一章 中国传统农业的诞生及特征

第一节 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及社会条件

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部门。它是利用生物机体的生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过程，实质上是动植物机体及其赖以生长发育的环境条件和人类社会生产劳动这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农业发生发展过程中，自然条件和自然环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地区自然禀赋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制约着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途径。而且，越是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就越是如此。

一、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

农业是人类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没有农业的发展和进步，就不存在人类早期阶段的文明。人们可以把人类早期维持生存的活动分为采集业、狩猎业、种植业、捕鱼业等，而只有农业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更为广大、更为稳定的空间和可能。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次重要的选择。“公元前 8000 年，世界上只有一些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小集团”，“在此后两千年内，出现了许多村落；在这之后的两千年间，一些村落变成了城镇；又过了两千年，城邦已经发展为帝国”。^①

大约 10000 年前，在世界某些地区，出现了农业和种植业。中国的先民最早成功培育了黍、粟和水稻，并出现了稻作种植；中亚、西亚的先民最早培育了小麦，并出现了麦作种植；在美洲，印第安人最早培育了玉米，并开始了玉米种植。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38。

中国广大黄河流域最早种植的是旱地作物——黍，大约到了公元前 6000 年改为主要种植粟，小麦和黑麦大约是公元前 2000 年开始在中国北方种植的，小麦种植到了汉代已经普及。中国传统农业则主要是建立在麦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基础之上。有人估计“就世界范围而言，在渔猎、采集阶段，每 500 公顷的土地，只能养活 2 人；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时期，同样每 500 公顷的土地能养活 50 人；连续种植的农业，可养活约 1000 人；而集约经营的现代农业，则猛增至 5000 人”。^①

中国农业之所以能较早地发生并较快地发展起来，并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业发源地之一，是因为中国为农业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大部分地区处在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这极易于人类的生存发展，也极易于农业经济的发生发展。

土地是最基本的资源，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它以其特有的品格和所藏，为人类提供住所，以及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纤维品。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广大富饶的土地，为我们的先民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条件，尤其是黄河中下游流域的黄土地带。黄土是由西北方沙漠和戈壁地区吹来的尘土堆积而成的，其质地疏松，土性肥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黄土具有的柱状节理和垂直节理，使之容易挖穴构屋，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和下游的华北平原以及沿河的台地，为农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耕地。《尚书·禹贡》将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这九州，并依据优劣分为九个等级，认为雍州为上上，兖州为上中，青州为上下，豫州为中上，冀州为中中，而这五个州均处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也就是说，在当时人看来，黄河流域是最适宜于人类生存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的区域。事实上，长江流域同样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土地条件，丰富的水资源和众多的河流使长江流域土地肥沃、气候湿热，极易于农作物的生长。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已证实，早在 7000 年前，长江流域一些地区就已开始种植水稻；而在稍晚一些时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则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城池和覆盖辽阔的水利设施。

良好的气候条件是农业发生和发展又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农业气候条件是指一定区域内由气候形成的自然条件，它包括太阳辐射、日照时数、热量、水分和空气，农业生产就是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来促进动植物成长发育的。中国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地形复杂的特点，气候呈现多样性特征。一些主要山脉多呈东—西、东北—西南走向，把中国分割成东、西两部分。西部为内陆气候，

① 萧洪恩，张玉璋，国脉民天：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M]。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223。

属干旱和半干旱区；东部为季风气候，属湿润和半湿润区。东部地区大部处于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气候温暖潮湿，又多为平原、丘陵和低山，为农作物耕作提供了优越条件。北方地区受季风影响，冬夏温差很大，冬季寒冷干燥的气流从中国西北侵入，一直抵达长江流域一带，使北方黄河流域冬季寒冷干燥。不过北方旱地作物的种植已经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了。

在历史上，中国的气候冷暖交替，几经变迁。中国学者竺可桢指出，在近5000年间，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的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在经历周代初期约两个世纪的寒冷变化后，气候在春秋战国时期又一次变得温暖了。大量的物候资料有力地证明在仰韶文化至战国时代这样一个较长时期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得多。二十四节气是根据战国时期所观测到的黄河流域的气候而定的，那时把霜降定在阴历10月24日，现在开封、洛阳秋天初露约在11月3日—5日；雨水节气，战国定在2月21日，现在终霜期则在3月22日左右。现在这一带的生长季节明显比战国时代短。可见，在战国以前，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潮湿，极有利于农业的发生和发展。

江河湖泊既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会危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如何认识和利用江河湖泊，趋利避害，始终是中国古代先民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正因如此，江河湖泊在古代往往直接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孕育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习俗和观念。纵观人类社会，人类文明总是起源于大河大江之畔。在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和莫恒卓达罗周围地区、爱琴海地区都孕育了最初的人类文明社会。这些地区适宜于灌溉耕作和定居生活的特征，使之成为发展种植业最好的地区。而这些农业发达地区几乎都建立了农业帝国，把自己的文明辐射到邻近地区。

二、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

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直是最重要的经济中心，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地势平缓、气候适宜，是中国历代政府的粮食生产基地和经济依托。也正因如此，历代政府也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中央集权体制，不但有利于在分散的农业经营体制基础上建立集中统一领导和政治统治，还有利于中央政府协调和集中全国经济力量，加强对江河湖泊的管理和治理。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东方社会的这一特点，认为东方社会由于对河流的利用和治理，必然要求政府建立很强的负责公共工程的职能和部门。美国学者魏特夫更是把中国视为“治水

社会”，不过透过中国许多古老的传说，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治水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例如，黄河被称为母亲河，它一方面给两岸的居民创造了生存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因为不断泛滥给人们带来洪水灾难。相传尧舜之时，洪水为患，鲧、禹父子接受尧、舜的指示开始治水，鲧治水所采取的办法主要是“堵”，但最后失败了，后由其子禹继续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①。大禹终于通过采用疏通和止塞相结合的办法，治理了河患。可见，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第一个社会功能，就是组织人民治理黄河。因此，黄河、长江不仅孕育了中国的农业文明，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

中国独特的地形条件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和北方，巍峨的山脉和高原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而在它的东方和东南，则由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所环抱阻隔。这种地势特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近于封闭的文化环境，或者说文化地理圈，使我们的先民很少与外界交往，并且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自己文化鲜明的个性。这种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征还通过以下几方面表现或折射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强化。首先，这种地理环境使中国农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日趋走上单一发展的道路，各种影响或干扰农业经济生活的外来因素被降到了最低点；其次，这种地理环境也使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得以开拓和发展，形成了一条由西而东、从北向南的轨迹，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三次农业化的演进历程；最后，这种地理和文化特征，也使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着重于融合与统一，大一统是这一相对封闭环境中的任何一个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和施政方略。

中国发达的农业经济和农业文明就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量的考古发掘说明，早在7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中游和长江流域下游的原始种植业就已经开始趋向于不同类型的发展。黄河流域中游由于地势较低、气候温和、黄土疏松易耕，具有发展旱地农业的较为理想的条件，成为北方农业的发祥地；长江流域下游则由于雨水充裕、气候湿热，成为中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

在中国北方农业生产区域还有一个历史现象需要我们注意到，那就是气候的冷暖交替也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时期农牧分界线南北游移、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角逐的重要因素。从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角度来看，中国北方传统农业和畜牧业长期存在着一种胶着状态。气候的周期性冷暖交替导致了北方传统农业与畜牧业的伸缩变化，周期性摇摆的农业和畜牧业分界线是中国传统经济起伏波动的诱因。大概年

① 司马迁：《图解史记》[M]，合肥：黄山书社，2015：20。

平均温度每下降 1°C ，北方草原就向南推延数百里，伴随着耕地变为草原，游牧民族就会向南发展；反之，年平均温度每上升 1°C ，则草原更适宜于耕种，农业民族就会向北扩展。几千年来，西北农牧分界线总是在长城内外胶着进退。到了明清时期，政府总想运用制度来稳定农牧分界线。明朝政府主要运用在北方驻扎强大的军队来确保整个控制版图内农业的稳定发展，这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朝政府则主要通过加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联合来实现农牧分界线持久的稳定。

三、农业发展的社会条件

中国的先民很早就选择了农业生活，并借以维持生存。距今10000年前后，原始的采集业就已开始向原始农业过渡。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如河南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以及河北武安磁山、西安半坡村遗址中，都曾大量的石、骨制农具出土，包括斧、铲、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在这些遗址中还发现有窖藏以及所贮藏的粮食。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也发现有骨耜、木耜和稻谷、稻壳、稻秆，所发现的稻种经鉴定为籼稻，中国是水稻的原产地得到了考古资料的科学印证。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及珠江流域部分地区的先民部落，都已经普遍地形成了以原始农业为主、兼营家畜饲养和采集渔猎的综合经济。

在中国古老的历史传说中，也广泛记述了农业发生和发展的美好故事。例如“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①；又如“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虻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之〕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②；再如“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③。多么美好的神话传说，我们的先民总是把农业的发明权赋予那些早已神灵化了的祖先偶像。透过神化了的外衣，我们仍能体会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发生的艰辛和久远。

到了夏商周时期，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和长江流域一些地区农业耕作区域日益扩大，游牧业以及其他非农耕经济活动被进一步挤向北部、西北部等边陲地区和山区，广大农业区域的家畜

① 应劭，风俗通义全译[M]。赵泓，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15。

② 刘安，淮南子[M]。长沙：岳麓书社，2015：203。

③ 商鞅，列御寇。商君书·列子[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60。

饲养业则越来越下降成为农耕经济的附庸和补充。特别是在西周时期，农业的地位空前提高。周人的祖先曾因善于农耕，后被尊为农神。周人是长期居于黄土高原、以经营农业为主的部落，周王朝建立后，农业也随之成为社会经济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在《诗经》中有许多记述当时农事的诗篇和章句，如《周颂》中仅记述与农事有关的诗就有六篇，《尚书·周书》里也几乎篇篇都有关于农业的文字记录。此外，我们还能从关于井田制的纷繁记述中看出当时黄河流域旱地农田区划、水利灌溉的景象。

中国古老农业的种植结构、耕作形式、交换形式和经营方式也决定了中国农村的家庭结构、社会关系、村落形制、地域分布和空间结构，使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很不相同的发展特点。例如，美国学者施坚雅将地理空间结构和集市市场体系引入中国历史研究之中，揭示了中国村落布局的所谓“正六边形”现象，这一理论假设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传统农业经济中村落形制和布局的特点。实际上，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中村落形制和布局还深受农业耕作形式与耕作能力的影响和制约。在传统农业经济形成早期，小农经济分布比较分散，户与户之间的距离也比后来要疏松，这才有了井田制的种种美好记忆和传说，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小农聚居的一种村落形制。到了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中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土地的稀缺，小农经济日益走向精耕细作的密集型农业，人们居住的空间距离缩小，形成了更加紧密的村落形制。村落的出现和密度的增大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传统文化成长的广阔基础。

正是由于农业经济地位的空前提高，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也表现出明显的重农倾向。早在西周时期，政府为了推动农业生产活动，形成并制定了一整套“籍田”礼仪。《诗经·载芟》序有“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的记载，《载芟》一诗记述了各级官员和农人在春日的大田里劳作的景象，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周天子“籍田”的场景。《通典·礼六》记述曰：“天子孟春之月，乃择元辰，亲载耒耜，置之车佑，帅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亩于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①讲述的就是在孟春正月，周天子率领诸侯大臣亲自耕田，完成这种典礼，然后全国再开始大规模的春耕生产。这种“籍田”的仪式性意义很大，表示政府重视农业生产活动。史册上记载，到了西周末年，周宣王竟改成规，“不籍千亩”，遭到虢文公的激烈反对。虢文公苦口婆心地劝周宣王说：“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

①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1284.

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①因此“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②。这种鲜明的重农经济思想是西周社会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

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文明在中国开始了它辉煌的发展历程。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锄耕农业，再到犁耕农业，我们的先民在漫长的岁月中一步一步地推动着农业向纵深发展。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中，已经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农业文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种植业和植物界成为中国人民最主要的衣食之源。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与欧洲农业发展的巨大差别。

春秋以降，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到了战国秦汉时期，随着小麦种植的日益普遍、铁器农具的广泛使用、牛耕的逐渐推广，农业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加之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剧烈变革，也强化了农业的地位和作用。秦汉之后的中国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虽是王朝更迭、百代兴亡，但这种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和地位却日趋牢固。

第二节 中国传统农业的确立及特征

中国农业在经历了漫长的原始农业发展阶段之后，逐步向更高的农业经济形态——传统农业经济阶段转化。这一转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到战国秦汉时期传统农业经济形成并确立。此后的两千多年来，传统农业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石。没有发达的传统农业经济，就不会有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古老文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在这种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取得的。高度发达的传统农业支撑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不了解中国传统农业，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传统社会。

① 郭国义，胡果文，李晓路．国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2．

② 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4．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确立

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在春秋后期开始取代原始农业，并在战国秦汉时期最终确立。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剧烈变革的时期，来自经济的力量和非经济的力量日益加剧，从而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旧的根基于夏商周三代的宗法组织、宗法制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宗法社会关系、宗法社会结构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原有的基于宗法的有序社会状态被打破了，原有的宗法等级序列也被超越了。经过春秋时期齐、宋、晋、秦、楚五霸相争，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种“礼崩乐坏”的局面。历史家司马迁描述这种状态：“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① 中国历史上重大的社会转型就是在这种“礼崩乐坏”的变动中实现的。

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新的更适合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经济组织和社会经济制度也在悄悄地形成。也就是说，战国秦汉的发展，所呈现的恰恰也是从原有的无序到新的有序的演变，在旧的有序被破坏的无序中，一种新的有序社会状态、一个新的社会序列正在形成。而这一新的社会经济组织和社会经济制度确立的突出标志，就是以个体小农的小规模经营，以精耕细作和劳动力大量投入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确立。

在战国秦汉时期，导致并促使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形成并确立的因素是多重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生产力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

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集中体现为农业生产工具、农业动力结构和农业技术体系的改进，这就为农业向更广阔的地域拓展和农业向精耕细作式的小规模经营转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

农业生产工具的变革突出表现为铁制农具的大量使用。在中国，铁制农具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战国秦汉时期已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之中。据考古发掘证实，战国时期冶铁业已相当发达，铁制农具已相当完备，目前发现的铁制农具有锄、镰、镐、锄、铲、耙、犁、镬、铤等。当时有“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

^① 司马迁. 史记精解[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 70.

铸鉏夷斤斲，试诸壤土”^①的说法，所谓“恶金”指的就是铁。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者来说，铁制农具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必不可少的装备，正所谓“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铤，若其事立”^②。到了西汉时期，铁制农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在《盐铁论》中有“铁器者，农夫之死生”^③的记载。铁器的广泛使用，使农业生产活动发生重大变化，大量过去通过木石工具无法开垦利用的土地被开辟为农田，农业的种植面积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农业耕种活动也变得越来越便捷省力，农业精耕细作耕作方式开始向纵深发展。

农业动力结构的变革表现为犁的发明和牛耕的使用与推广。犁的发明在中国农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业革命。从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犁来看，它呈V字形，还没有设计犁壁，因此这种铁犁主要用于破土划沟。西汉关中地区的犁已相当先进，有铤有壁，既有单壁的，也有双壁的，这种犁具备了翻土、灭茬、开沟、作垄等多种功能。铁犁的广泛使用和改进，极大地提高了农业耕作效率和耕作水平。利用大牲畜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力资源，是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重大进步，它加强了人的活动能力并使之得以扩展和延伸。特别是在农业生产领域，牛耕的使用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牛耕在战国时期已被人们普遍使用，到了秦汉时代更成为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动力。由于大牲畜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保护耕牛也日益重要。商鞅在秦国制定的法规规定，对于盗窃牛马等大牲畜的人要严加治罪，“盗马者死，盗牛者加”^④；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也发现有记述着许多对盗牛者进行严厉惩罚的条款。牛耕和犁的使用，为中国传统农业奠定了基本的物质技术基础，在之后的两千多年中，这种技术基础都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二）社会政治改革加速经济结构确立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社会政治改革，强有力地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形成并推动了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确立。这一时期各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富国强兵，希望在新的多国政治角逐中居于有利地位。富国强兵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并发展以个体小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经济。

社会政治改革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不仅挽救了当时普遍而深刻的社会

① 左丘明. 国语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58.

② 刘绩补注. 管子补注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6: 433.

③ 李敖. 礼记·康济录·盐铁论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6: 282.

④ 杨宽. 战国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219.

政治与经济危机，也有效地选择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塑造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雏形。由于时代的急剧变化，各国的改革此起彼伏、相互效法，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政治风尚。危机提供着机会，动荡加速了选择。管仲在齐国的改革、子产在郑国的改革、吴起在楚国的改革、李悝在魏国的改革、商鞅在秦国的改革，都不约而同地强化着传统农业经济的选择方向，促进着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确立。所谓“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民众而兵弱者，民无取也”^①，这说明军事和农业的关系就是强兵和富国的关系。

富国是进行政治改革的经济目标，强兵是进行政治改革的军事目标，而富国强兵本身又是各国追求的政治目标。李悝（前455—前395年）在魏国进行社会政治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就是他紧紧抓住对农业的改革。他在魏国实行“尽地力之教”，即充分合理地利用土地，发挥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大力发展小农经济，保持并维护小农经济的再生产。同时加强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干预，通过改善政府平糶措施和赋税政策，使小农经济抗御自然灾害和维持再生产的能力提高。李悝改革“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秦孝公梦想通过推行政治改革来改变秦国落后的面貌，商鞅（约前395—前338年）借此机会为秦国改革献计献策。为了试探秦孝公的改革决心，他为秦孝公讲“王道”和“帝道”，秦孝公不以为然，这让商鞅受到了冷遇。他抓住机会转而讲“霸道”，则让秦孝公精神为之一振，大加赞赏。商鞅从此得到重用，开始在秦国变法改革。这一事实本身很能反映当时各国统治者的一般心态和政治愿望，富国强兵的“霸道”就是当时的一种合理的生存选择。古人早就明确地揭示了这样的历史逻辑：“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则地广。”^② 农业经济攸关国计民生、国家存亡，农业生活被赋予了一种超乎经济之外的政治意义。

战国时期各国中变法最为彻底、所遇阻力较小而成效较大的要数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就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

① 管仲·管子[M]. 刘晓艺,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② 管仲·管子[M]. 刘晓艺,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323.

也”^①。他主张“当时而立法，因时而制礼”。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在秦国建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公元前359年，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他在秦国推行《垦草令》，以此拉开变法的序幕。公元前356年开始较为彻底的变法改革，他把培植小农经济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首先“为田开阡陌封疆”，把过去旧的土地制度废除，使土地经营者和农业生产者与土地结合起来，由他们专心致力于农业生产，“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②。为了促进并确保小规模土地经营，政府明令解散大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并“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最极端的做法就是他的“农战”政策，把农业生产和英勇作战紧密结合起来，为了奖励农业生产和勇敢作战，规定凡“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即免除其徭役负担；凡积极参军、勇猛作战者，则“各以率受上爵”。重视农业和战争，势必抑制并限制各种非农战的经济社会活动，对“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与此同时，广泛招徕三晋无地少地的农民到秦国开荒垦田，政府给予经济扶持并免其三代徭役。

小农经济焕发出的巨大生产能力是秦国得以统一中国的深刻根源。应该说，中国农业发展到战国时期，无论是在生产组织方面，还是在经营方式上都找到了突破口，这便是小农经济所表现出的在经济上的巨大优越性。秦汉时代，小农经济已是汪洋大海，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已经形成并确立。

（三）连绵战争的剧烈催化作用

连绵数百年的大小战争，对传统农业经济的形成和确立也起到了强有力的催化作用。战争是政治和经济的继续，是一种激烈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对峙与冲突的表现形式，战争总是体现着一定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要求。

战国秦汉时期频繁的战争成为震撼和动摇旧的政治格局、经济关系的强有力的冲击波，催化和促进着新的政治格局、经济关系的形成和确立，特别是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形成。第一，这一时期战争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争城略地、抢夺人口。土地和人口是进行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也是各国统治者争霸角逐中最关心的事情。“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争夺土地和人口，就是争夺势力范围。第二，战争使社会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也出现了空前的大调整。旧的等级制度在频繁的战争中日渐摧毁，

① 广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商君书·更法》 荀况《天论》 韩非《五蠹》译注[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4：6。

② 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店，2016：569。

旧的经济格局也在剧烈的争霸中被超越。战争瓦解了夏商周时期的土地公有制和残存的农村公社组织，使大量的村社成员摆脱旧的经济组织的牢固束缚，得到人身自由。第三，战争使土地占有普遍化，许多人因立军功得到了数量可观的土地，这为他们选择新的经营形式提供了可能。这种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的做法，直接目的虽然是鼓励作战英勇无畏，但它却为土地私有化创造了契机。《管子》中曾讲：“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战争就是一种“腐蚀剂”，瓦解着旧的社会秩序；战争又是一种“催化剂”，加速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壮大。

正是在以上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形成和确立的前提条件日渐成熟。

二、中国传统农业的特征

传统农业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农业、19世纪以前的亚洲农业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农业都基本上处在传统农业阶段。与原始农业相比，传统农业的一般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生产工具明显改进

原始农业的生产工具主要是木石复合工具，生产工具的简陋使原始农业无法大规模扩展开来。传统农业时期较为先进的铁木复合农具代替了木石复合的原始农具，农具的种类也因农业生产活动的多样化而大大增多。在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活动中，相继发明和推广了铁犁、耒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农业耕作、水利灌溉和农业加工方面的新型生产工具。尤其是铁器等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改变了传统农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面貌。

（二）农业动力资源充分开发

在原始农业时期，人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动力，《诗经》中记述的“耦耕”大概就是一种原始农业的劳动形式，所谓“千耦其耘”“十千维耦”；春秋时期子产讲到郑国先民在建立国家之初，“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①，也是一种原始农业的开垦方式。除了农业生产者以外，在传统农业中人们广泛地使用畜力和其他自然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牛、马等大牲畜日益成为农业活动的重要动力，为农业向更广更深层次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过去难以利用的土地被开垦出来，并通过深耕细耨等耕作方式得到了改良。同时，水力、风力等自然力也开发利用，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服务。

① 左丘明，左传全鉴[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241.